

科学哲学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现在位置: 首页 > 科学哲学](#)
[【小中大】](#) | [【打印】](#) |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 亨利·摩尔自然哲学概述

田 径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亨利·摩尔在17世纪的英国思想界有着重要地位。他第一个把笛卡儿哲学系统地引入英国, 他的时空概念是牛顿绝对时空观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本文简要介绍了摩尔自然哲学的来源、主要思想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亨利·摩尔 自然哲学

亨利·摩尔, 神学家, 形而上学家, 是17世纪中后期剑桥柏拉图学派两个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另一个为卡德沃斯)。笼统地说, 剑桥柏拉图学派是指在一些神学家领导下的一群宗教思想家。这些人并不全都是柏拉图主义者, 甚至也并不全是哲学家, 人们把他们看作是同属于一个学派, 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互接近的宗教态度。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站到任何党派一边, 其学说也同样远离加尔文主义和高教会主义。他们将自然哲学中的活力论、伦理学中的思辨倾向和高尚的道德感情与合理的宗教宽容作了富有创造力的结合, 反对轻信和狂热, 认为真正的宗教必须与理性的真理和谐一致, 强调宗教中道德与精神的因素, 这些与霍布斯和笛卡尔哲学、与经验主义和加尔文主义, 总而言之, 与17世纪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倾向相对立。

亨利·摩尔1614年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 曾先后进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与剑桥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接受教育。1631年11月, 也就是弥尔顿离开前6个月时进入基督学院, 从此就再没离开过这所学校, 一直到1687年去世。他一生都没有参与过任何公众事务, 未受干扰地度过了内战、共和国和复辟时期。对于涉及到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 摩尔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一直关注着那个时代的科学研究和神学争论。早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关于自然和神的知识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可以想象的到的最高的快乐和幸福”。他的父亲是个加尔文教徒, 但是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来看似乎并未受这种教派思想多大影响。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 并在埃德蒙·斯宾塞的诗的引领下转向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作为一位护教学者和形而上学家, 摩尔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关于上帝的知识, 学习和研究知识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全善, 其思想的宗教目的在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和笛卡尔出发于同一个起点, 尽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低洼的德谟克利特之路, 穿行于浓密的原子和飞速的物质微粒之中; 另一条飞行在高耸的柏拉图主义山峰上的空气之中, 这是稀薄而又精细的精神领域——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达到了同一个终点, 即《圣经》的大门, 我们最终都把各自的努力与神圣的基督教联系起来。”<sup>[1]</sup> 物质和精神是世界的两面, 而当时的新兴哲学含有无神论倾向, 他们否认精神实体乃至上帝存在。霍布斯和复辟的唯物主义原子论者否认精神的存在, 笛卡尔虽然承认精神的存在, 但又把它们二者割裂开来, 摩尔对这些观点都不能认同。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虽然是物质的, 但摩尔坚信有某种内在的精神运动于其中。如何才能够把精神和物质这两种实体

完美地揉合起来, 这正是摩尔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他的思想中既有理性主义成份, 又有神秘主义成份; 既有对宗教的辩护, 又有对新科学的赞誉; 既接受柏拉图、普罗提诺的唯灵论, 又保留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其思想虽然来源极为复杂, 但是主要还是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 即摩西、柏拉图和笛卡尔。他把这三个人思想看作是整个哲学史的缩影, 是异教徒和基督教传统相结合的完整体现, 认为把他们的哲学相结合有可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1662年出版的《哲学著作选集》前言中, 摩尔指出: “最早的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已经蕴含了后来我们称作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哲学思想, 前者是后者的灵魂和主要思想来源, 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身体和展开罢了。但是自古希腊开始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分离趋势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形而上学家们越来越深入到稀薄精细

的精神领域，去关心非物质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原子论哲学家又置身于物质实体之中，过分相信它的力量，他们都偏离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一直在试图把古希腊令人尊敬的智慧重新运用到生活中，把久已分离的灵魂与肉体重新结合在一起，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并没有什么可令我沾沾自喜的。”（[1]，p. 78）先解决灵魂与肉体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助于那个困扰着摩尔的根本性难题的解决：我们如何理解整个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是如何结合的？摩尔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记载了摩西的原意的《圣经》中去寻找答案。“（如果对《圣经》做了恰当的理解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尽管在卡巴拉（*Cabbala*）<sup>[2]</sup>哲学中，在摩西传统中早已经给出了答案，可是至今为止仍旧没有一种自然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地球运动这一现象的完全合理的解释……”“灵魂在肉体前已经存在这种观点，看起来也是属于这一传统，早已经得到理性的完全认同。”（[3]，p. 63）据摩尔在《卡巴拉哲学的臆测》（*Conjectural Cabbalistica*）的考证，摩西的思想中也包含有灵魂不朽和上帝的三位一体观念。

与其它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摩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追随者。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柏拉图的学说，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引用柏拉图，但却常常引用普罗提诺的著作。在1642年他的第一部出版物《柏拉图的灵魂之歌》（后来收入他1647年出版的《哲学诗集》中）中，他宣称自己是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信徒。诗的标题分别是：1, *Psychozoia*, 生命的基督教柏拉图式的呈现；2, *Psychoathanaiia*, 灵魂不朽的柏拉图式的诗篇；3, *Antipsychopannychia*, 对死后灵魂将会沉睡的驳斥；4, *Antimonopsychia*, 灵魂的众多性。在1642年，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热衷态度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的前言部分最为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柏拉图主义的赞赏之情：他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本原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之间有某种内在关联。新柏拉图主义的三个本原太一（*the One*）、奴斯（*Nous*）和灵魂（*Soul*）可以被理解成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柏拉图主义的本原是无所不在的，他们超越人类理性所能设想的范围，因为他们能够在每一个瞬间存在于任何地方，本原的这些属性也与上帝相吻合。（[4]，p. 303）摩尔认为，柏拉图主义的三位一体观念来源于摩西，在这方面摩西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毕达哥拉斯起到了关键作用。毕达哥拉斯十分熟悉摩西或犹太哲学，他是摩西的东方智慧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桥梁。毕达哥拉斯关于地球运动的理论和摩西之间有着某些渊源：“人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认为地球是运动着的，根据卡巴拉哲学中‘神在第四天的工作’所描述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毕达哥拉斯曾经遇到过某个来自东方的牧师或哲学家（我们现在这样称呼他们），并从他那里接受了卡巴拉哲学中有关创世纪的描述。毕达哥拉斯把他们和自己的数的神秘性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哲学理论。”（[3]，p. 82）例如，对毕达哥拉斯来说，数字10（1+2+3+4=10）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地球是在创世纪的第四天被创造出来的。摩尔认为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来源于摩西的基本概念是，灵魂与可朽的肉身的结合意味着它的沉睡，灵魂真正的生活处于离开肉体之后的自由状态中，也就是肉体死亡之后。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应该很了解摩西所行的奇迹，从摩西和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以及他的后人的思想有着某种一脉相承关系，“他们（指柏拉图及以后）的哲学与毕达哥拉斯是一致的，甚至也与摩西的思想非常接近。”（[3] pp. 111-113）

摩尔把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自然哲学看作是古希腊原子论的思想先驱。他猜想原子论的起源要早于古希腊哲学，因为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曾经提到过，毕达哥拉斯在西顿同一个名叫摩萨斯（*Mochus*）的人的继承者进行了晤谈，并把他的学说传入希腊。这个摩萨斯生活在特罗伊战争之前是一个西顿人（腓尼基人，塞姆族的一支），名气与摩西有些相似，因此，摩尔推测他可能就是摩西本人。摩萨斯的哲学主要有两个部分：“原子物理学（*Physiology*）和神学或灵学”。摩尔认为摩萨斯是“原子论哲学的第一个阐述者，他第一次从粒子的数量和运动的角度对现象进行描述。在从这种古代的摩萨斯或摩西的哲学到笛卡尔物理学之间的漫长岁月中有某种思想的紧密传递，以至于这种观念已经如此自然地成为笛卡尔思想中的一部分”。（[3]，p. 112）

第欧根尼曾经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一起从事研究，他甚至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斐洛劳斯（*Philoaous*）的亲密朋友。摩尔认为第欧根尼确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具有原子论的某些特征，是他们把这一思想传到德谟克利特那里的。德谟克利特由于倾向于无神论而采取了前者，抛弃了后者，柏拉图则采取了相反的路径。摩尔认为下面这则故事可以支持这种各学派之间的思想传递：当柏拉图想要烧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时，正是两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艾米克拉斯（*Amyclas*）和克利尼亚斯（*Cleinius*）劝阻他不要做这样的错事。虽然柏拉图的很多观念都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他却拒绝用原子论的观点来解释事物属性，他甚至对原子论的地位和影响都保持缄默。无论柏拉图是否真正算得上数学原子论主义者，他显然不认为由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发展起来的原子论有什么值得称颂和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古希腊原子论者对神圣的创造者的否认，他们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以及他们把身体的感知作为知识的起点的观念，都是令柏拉图 and 任何柏拉图主义者极为厌恶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的影响下重新复兴了古希腊原子论，伽森狄就是十七世纪的一个主要代表。但是摩尔与他们对待原子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摩尔之所以在一开始时就积极地宣扬笛卡尔哲学，并把他看作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原子论的伟大复兴者，是因为笛卡尔的原子论并不属于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伽森狄这一唯物主义原子论传统。摩尔写道：“我不得不猜测他（指笛卡尔）让人难以置信地完成了对摩西哲学的真正复归，这种哲学在其最原初的意义上就是自然哲学”。（[3]，p. 112）摩尔认为我们可以从德谟克利特在他那里学到的知识中推断出毕达哥拉斯主义自然哲学的主要特征：“如果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思想全部出自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著作或哲学传统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毕达哥拉斯持有以下观点：存在着无数个世界，他们是可以不断产生和毁灭的，但是物质（即原子）是不可毁灭的。宇宙中有无限数量的原子或粒子……它们是以涡漩的方式在其中运动。”（[3]，p. 113）从摩尔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与毕达哥拉斯的思想非常相似。在摩尔眼里，笛卡尔的最伟大之处或许就在于他复兴了摩西—毕达哥拉斯哲学。

摩尔认为古希腊原子论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有些过分武断，他们为了贯彻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与宗教断绝了关系。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柏拉图才坚决拒斥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并在自己的哲学中保留了宗教和自然界中精神性因素的重要地位。摩尔认为，笛卡尔虽然正确地抛弃了德谟克利特的彻底唯物主义，但是他却没有看到柏拉图唯灵论唯心主义的真正妙处，笛卡尔并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原子论者。因此，摩尔认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就是通过把笛卡尔哲学与柏拉图主义相结合，进而完成笛卡尔所未完成的哲学的伟大复兴。这样一来，纯粹的原子论和宗教就会像摩西时代一样重新结合在一起。摩尔对笛卡尔哲学的这种理解，在现代人看来是很陌生的，但是17世纪的人们对像摩尔这样把新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相结合的主张再熟悉不过了。通常认为，作为原子论者的摩尔曾经给牛顿授过课，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摩尔只教授柏拉图主义原子

论哲学，而不教授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传统的唯物论哲学，摩尔从未赞同过他那个时代正在复兴的伊壁鸠鲁原子论哲学。他在1646年所写的诗“柏拉图主义的德谟克利特”可以看作是对自身立场的一种表达：他是原子论者，但是是一个修正了的原子论者。虽然摩尔意识到在综合柏拉图主义和原子论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无法解决，但是他认为这一结合至少在历史上曾经成功过。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之后，由于整个世界长时间被其他哲学体系所统治，导致了原来深奥而又正确的世界观已经失落了，至少是被歪曲了。正是笛卡尔通过自己的睿智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才将这个世界观又重新挖掘并展现出来。在笛卡尔《哲学原理》的鼓舞下，摩尔深信创造出一种结合了各家长处的哲学是有可能的。

摩尔在他心目中构想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链条：摩萨斯或摩西，毕达哥拉斯学派，笛卡尔（出现于由亚里士多德主义长期统治的真空期之后）。在毕达哥拉斯之后，柏拉图和他的继承者创造了一个哲学传统，他们崇尚精神的或唯灵论形而上学，但是却忽视了宇宙的物质性结构，这一点是他们自然哲学的局限性。与柏拉图主义并行的是由德谟克利特创立的原子论传统，他们在发展了摩西和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观念的同时，却又迷失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倾向中。毕达哥拉斯之后的柏拉图理念论和原子论唯物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一直影响着摩尔对笛卡尔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摩尔试图把德谟克利特赋予原子所固有的完全自足的观念同原子论本身分离开来，他认识到是“柏拉图学派首先提出了物质不能自身运动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很明显除了物质以外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起着推动或固定它的作用”。（[1]，xv）事实上，柏拉图主义的这种观点与笛卡尔之间有着很大差异。摩尔不断提高对自然界中精神性力量的重视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笛卡尔主义和柏拉图主义无法完全融合在一起。看起来，是摩尔丢开笛卡尔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了。

## 二

在《哲学著作集》中，摩尔第一次指出，尽管自己不断重申对笛卡尔自然哲学的赞赏，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对笛卡尔的观点持有很强的保留意见。在前言中摩尔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存在着一种自然精神（*Spirit of Nature*），一种非物质实体，它是世界上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得以产生的真正原因，我想我已经完全证明了它的存在，在哲学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一观点更具有明证性的了。”这种精神是“由全知的上帝为了宇宙的顺利运行而赋予自然的较低级的本质能动性（*Activity*），它自身就包含着一些最基本的自然律和自然的运行方式。但并不包括特殊的天意（*Providence*）”。（[1]，xvi）精神统治着自然界的一切日常事务，它赋予物质以能动性和生机。自然精神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古希腊的世界灵魂概念，它是“一种无形体的实体，虽然没有感觉也没有评判力，但却主宰着整个物质世界。它按照物质所具有的各种多样的特质（*Predisposition*），根据不同的时机，把一种‘塑造力’（*Plastical Power*）施加到物质之上，通过指引物质的运动和方向，在世界上产生出不能只被分解成机械力的现象。”（[5]，p. 254）自然精神在上帝之下，是一种“次等的世界灵魂”（[5]，Sec. 12），它确保了上帝赋予所有造物等级的一致性，但是它的行为并不凌驾于机械必然性之上。它既是重力产生的原因，也是琴弦振动的原因，它塑造子宫中的胎儿，也使鲜花从土地中生长出来，因为它自身中就包含着自然界的运行方式和自然规律。（[5]，Preface）机械决定论认为自然规律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起作用，是因为上帝就是按照机械的框架来创造世界的，因此想脱离这种框架是不可能的。摩尔则有意把自然规律这一概念从机械决定论的情境中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普遍存在的自然精神概念，他试图从公理和规律的层面上瓦解决定论的作用。如果对自然现象进行考察，会发现自然精神比盲目必然性或机械因果律更好地解释了自然现象。就自然精神来说，唯一一件算是决定论的就是它自身的活动也是按着某种确定的方式进行的，比如作为其体现的重力，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也是以一种可以预言的方式进行的。

精神是诸多自然运动的原因。机械论者认为，尽管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完全坚硬的，但是这些构成物质的微粒自身具有固有的弹性；摩尔主张是自然精神提供了粒子之间的弹性斥力，这种斥力是惰性物质无法自身生成的。一个物体浸在一种比它本身密度还要大的液体中，将会上升并漂浮到液体的表面，机械论者认为这是因为密度较大较重的液体会对该物体施加一种向上的压力；摩尔则认为这是自然精神在维护着事物存在的正确秩序，轻的物体本来就应该处在重的物体之上。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摩尔的思想中包含有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有机论观点。摩尔1647年的《哲学诗集》中的一段注释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似性，生殖力量（*Spermatical Power*，即创造性力量）是自然精神的前身：“它（生殖力量）严格地说属于植物，但是在动物体内它就转变为一种塑造力。我把它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磁力（或魔力，*Magnetick Power*）领域，动物的躯体就是由这种力量所驱使和决定的，因为任何一种磁力都能够在自然（*Physics*）中找到”（[4]，p. 434）。从广义上看，自然精神是维持自然界中造物的完整与和谐的能动者（*Agent*），这种自然的完整与和谐恰恰是事物和事件之间的偶然性、必然性和机械连续性所不能赋予的。摩尔的自然精神概念在其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与“自然”（*nature*，或本性）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的作用非常相似。什么是自然精神所要维护的秩序（*Order*，或正常状态）呢？它是一种状态，在一个分等级的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处在自己应该处于的恰当位置，一切自然运动都是物体向它恰当位置的回归：“自然精神使所有事物都处在正确的秩序中，当事物处于不均匀或不合比例状态中的时候，自然精神会按着相应的比例和力度把它们重新恢复到正常状态。因此，无论一个物体所处的位置离它的正确位置有多远，无论它们之间有什么阻碍，自然精神都会把它调节到恰当的位置。”（[5]，p. 83）在前伽利略时代，当描述物体下落的加速度时，人们认为下落的物体与下落时通过的介质之间的密度比值越大，则导致物体下落的力量就越大。摩尔的观点则更加接近亚里士多德：在我们把一个沉浸在水中的水桶提出水面的过程中会感到它变得越来越重，摩尔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精神在阻止我们将它从它原有的自然位置挪开。在《论灵魂的不朽》的序言中，摩尔把自然精神称作“上帝作用于物质的（中间）代理力量”（*the vicarious power of God upon Matter*），并认为这种力量可能会使得机械论哲学中一些理论失效。

物质粒子自身在没有引导下是无法组成一个有机体、一个活的生物的，就像一群天生既盲又哑的人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相结合就能建造出一座城堡一样。（[5]，p. 87）“因此，很明显自然界的一般现象不是物质的纯粹运动所产生的结果，而是被某种完美的智慧、某种非物质性的原则所指引着的。”（[5]，p. 88）从一般的意义上看，摩尔的这种观点与认为自然界的内在一致性、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绝不是偶然产生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摩尔眼里，笛卡尔的错误在于他满足于把这个如此普遍和基本的问题解释为仅仅是物质聚合的结果，这等于说基本粒子之所以能够聚合成一个个有形事物是因为它们相互临近并且正好处于静止状态，这看上去完全是一种搪塞之词。对于摩尔来说，与其把物质的这些根本属性解释成聚合力、重力或者运动，倒不如引入自然精神这概念。在接受笛卡尔的惯性定义时，摩尔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当我们向天空中投掷石块的时候，如果不是存在着某种机械力之外的力量，使石块改变了原有的惯性运动，使它又重新落到地球

上的话，那么还会是什么原因使得石块没有按着惯性飞离我们的视线，飞到遥远的天空中去呢？”（[5]，Preface）如果说笛卡儿或牛顿的运动定律代表了“机械的”一词所涵盖的意义的话，那么仅仅依靠这种运动定律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能够解释重力这一现象的机械论答案。要想不自相矛盾的话，还必须要引入辅助性和特殊的假设才成，在笛卡儿那里是涡旋假说，在牛顿那里是万有引力。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摩尔直接给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某种非物质性的原因，例如我们所说的自然精神，或世界的次级灵魂（*inferiour Soule of the World*），它们指引着以太粒子作用那些较重的物体，将它们朝地球的方向推动。”（[5]，p. 257）摩尔也认为涡旋是产生重力的直接原因，但和笛卡儿不一样的是，他不认为涡旋处在一种自足的状态，涡旋的方向是由自然精神决定的。在较早完成的《无神论的解毒剂》（1653）中，摩尔就曾经指出：“如果不是存在某种比纯粹的物质搅动更高的原则在起作用的话，天体为什么都呈圆球状呢？”（[6]，p. 39<sup>f</sup>）摩尔的精神既不是刻意的也不是任性的，实际上它起作用的方式不依赖于人类的意愿：石块必然永远向下落，而气压计中的汞柱必然维持在高位。从运行过程中的规律性来看，自然精神与笛卡儿的机械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等价的。

虽然摩尔的对手是笛卡儿这样的权威人物以及玻义耳、胡克这样的经验哲学家，但是他仍然拒绝接受是自然界自身在按照规律运行这一观念。当时的哲学家普遍认为自然律是上帝的神圣意愿所颁布的法令，因此就自然律本身来说并不排斥宗教，摩尔也没有否认过自然界的规律性。对于摩尔来说，真正难以接受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那种认为惰性物质自己能够遵循规律活动的假设，让人感觉好像物质能够认识到规律并且也能够支配自己的行为。赋予物质一种活力，无论是重力、弹性力还是磁力，都是在试图使物质超越其自身的惰性限制，因此摩尔坚持认为物质服从自然规律必然是出于某种精神性的原因。既然我们无法想象物质是有智力的，那么这个原因就一定存在于上帝直接的干预，或者通过一个有智力的中介的间接干预之中。牛顿接受了前一种答案，而摩尔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种。可能对于摩尔来说，上帝为了保持宇宙的一致性而时时处处对每一个物质粒子进行作用的观点有太多连续创始的意味，而这有悖于《创世纪》的教旨。

### 三

1630年代的摩尔还是个虔诚的、对世界充满幻想和渴望的年轻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科学深深地吸引着他，但是等到他成年以后却离开了这条道路转而成为一个神学家。事实上可以把摩尔的早期著作看作是1660年代之后的神学研究的一种铺垫，新柏拉图主义对摩尔来说起到了背景知识的作用。在摩尔出版的著作中也能看出这种思想转变，摩尔自己也认为他从自然逐渐转向了天启。这种转变开始于16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他开始对笛卡儿主义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的唯灵论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至少不能简单地把对笛卡儿主义的失望看作是这种转变的原因。对摩尔来说，笛卡儿虽然重要，但是还没有重要到这个程度，以至于为了他的反宗教倾向而让自己转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可能是某种较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使得他发生这种转变，很可能与他跟康薇夫人（Lady Conway）之间的关系有关。和摩尔相比，她更像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尽管他们早在摩尔第一部主要著作《无神论的解毒剂》问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友谊，但是他们之间密切的思想交流却要晚一些，与摩尔从哲学转向宗教的时间十分吻合。一方面，摩尔自身已经开始向宗教这一领域倾斜，另一方面，康薇夫人当时正专注的问题也促使摩尔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因为她在他们之间多年的交往中希望摩尔给予的主要是信仰上的指引，而非哲学难题的解答。

摩尔认为自己首要的角色是基督教护教学者，他在这里公开声明的立场也可以看作是剑桥柏拉图主义的普遍立场：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关于上帝的知识，学习和研究知识是为了履行宗教职责，学者对宗教的热情应该投入到对无神论和嘲笑宗教的观点的批判之中。摩尔在当时英国的宗教界影响颇大，他可以被看作是英国近代自然宗教的开路人和奠基者。早在1653年发表的《无神论的解毒剂》中，摩尔就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世界是由上帝仁慈的眷顾而被创造出来这一观念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地球始终围绕着太阳转动，而地轴却能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就暗示着存在一个有意识的上帝在维持世界的秩序。我们地球上海洋和陆地的差异、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美景以及它们对于人类的有用性、动物肢体各部分的精巧构造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它们是有意识的设计和创造的结果。摩尔很详尽地描述了心脏和血管的复杂系统，这些对后来的自然神学都有很大影响：“眼睛的用途是看东西，它的精致复杂的结构很明显就是为着这一用途而被设计出来的。……如果人类想要通过其自身的智慧来为自己设计这一器官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出如此精巧的发明呢？”（[6]，p. 79）肌肉和耳朵的生理结构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上帝的智慧》（*Wisdom of God*, 1691）被人们认为是17世纪英国自然神学最优秀的著作，该书的作者约翰·雷（John Ray）在剑桥三一学院就曾经讲授过《无神论的解毒剂》，摩尔的自然神学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7]

摩尔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在这个理性和哲学主导的时代中，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行为与基督教的信仰相符，首先就得遵守的准则是：“他一定不能反对任何体现着明晰和确定的理性的事情，特别是当它与基督教信仰相矛盾时，一定不要轻易就反对它，除非它很确切、很清楚地与圣经中确定无疑的神谕相悖。”也就是说，宗教权威并不具有完全凌驾在世俗理性之上的特权。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神谕是可以接受人的考察的，但是摩尔仍然在第五条准则中对理性进行了一定限制：理性法则并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哲学家在准备作出与宗教信仰不一致的论断时应该非常非常小心谨慎。虽然这些准则在1664年出版的《申